

半世紀公務生涯——我的學習歷程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
八十五年會員大會專題演講

昌彼得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大家午安。今天人文社會科學館際合作會議在故宮博物院召開年會，我以地主的立場，對各位的光臨敬致誠摯歡迎之忱。這次年會承曾館長邀我做一專題演講，我想把我學習的歷程向諸位做一個報告，或許能對諸位將來的治學提供一點參考意見。

一、與版本目錄學結緣

我是學歷史的，進入圖書館工作並不是我的素願，然而我進入之後，竟一輩子都在從事圖書版本目錄學的研習，這也許是一種機緣。民國34年的夏天，我從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因為我進中大唸書，是我自恩施高中畢業後由湖北省政府保送的，照理說應該回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服務，而且也跟湖北省政府駐重慶辦事處接洽妥當，只是那時我正趕寫畢業論文繳交，暫時留校而耽擱了去恩施的時間。就在我趕寫論文之際的8月間，適逢美國空軍先後在日本廣島、長崎各投擲了一枚原子彈，迫使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重慶可以說是完全沉浸在抗戰勝利的狂歡中。因為戰爭結束，在重慶的湖北省政府辦事處通知我暫緩去恩施報到，說湖北省政府要著手復原到武漢，於是工作就沒著落了。那時恰好我的系主任張貴永（致遠）教授告訴我中央圖書館蔣復璁（慰堂）館長需要一個編纂史籍考的助理，問我願不願意接受，對在徬徨之中的我而言，能有一個工作而且與所學的歷史相關，我欣然地接受了。8月底我就到中央圖書館報到，自此踏入了圖書館界。

清朝初年的學者朱彝尊曾編了一部三百卷的《經義考》，是我國經學專著的總目錄。乾嘉時代又有謝啟昆編了一部《小學考》以補《經義考》之缺。同時，著名

文史學家章學誠繼編了一部比《經義考》還大的《史籍考》，專考史部的典籍。《

小學考》、

《經義考》曾出版，但《史籍考》並未付刊，這部稿子在咸豐六年洪楊之亂的時候被燒毀了，沒有傳下來，所以蔣館長計劃完成前修未竟之志，欲編一部《史籍考》，聘西南聯大教授尹石公（炎武）主持其事，同時擔任助理的尚有童養年、楊全經、傅樂成諸君。從9月起我開始每天蒐集關於史部書的資料，這是我接觸中國目錄學的開始。

民國35年初，中央圖書館開始復原南京，我因要回孝感老家省親，又在武漢待了一個多月，於5月到南京，才知道《史籍考》的纂修工作停下來了。因為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期間收購的以及接收敵偽的善本書堆積如山，亟待整理，所以把《史籍考》的工作結束，工作人員分調各單位，我被分配到特藏組整理考編善本書。因為善本書的考編並不是我原來進入中圖的目的，而且我對版本學、目錄學與圖書編目都沒學過，所以我當時感到非常徬徨而想離開中央圖書館，於是去找拜訪我的業師賀昌群先生，說明想回中大當助教。可是賀先生聽了之後大不以為然，說：中國古代的學者想要看內府的藏書，像東漢的黃香、南宋的鄭樵，都要得到皇帝許可才行，你現在有這麼好的機會，怎麼可以輕言放棄呢？他並且教導我，每編一部書時要先



看其書的前序、目次、跋文以及各家藏書志對此書版本的記述，這樣對一部書的版本流傳情形就可以了解。假使每天編三至四部書，那麼一年就看了一千部的書，這是何等難得的機會。在賀老師的鼓勵教誨之下，我從此就在中央圖書館定下心來了。從35年5月到37年底在南京考編善本工作了二年多。

在中央圖書館工作時，有二位老先生使我受益最多，一位是尹石公先生，當時我們每個人的編目草簽都要經過他和屈萬里先生的複核，我與尹老曾在重慶共事半年多，比較熟悉，遇有不懂的，常去請教他，尹先生總是不厭其詳的指導我。尹先生熟於書林掌故，對當代學人的事履也非常熟悉，幾乎每天晚上我都到他辦公室（尹老孤身一人，孑然無家），聽他談論近代藏書家瑣聞。他博聞多識，談吐風趣，使我在這方面啓蒙發憤，可惜只有一年多，36年秋天他辭職到國史館任纂修清史工作去了。另一位是葉仲經老先生，在那時已是70多歲高齡，葉老曾在南京舊書店工作很久，能鑒別版本，對於舊書店的營運，諸如收售方式、偽造宋元版本方法等等，相當熟悉，關於版本學方面的知識則受他的啓迪不少。我考編善本的時候，儘量選取儒家方面的書，凡遇我不懂的佛教經典就送請葉老先生來編，所以我編的可以說都是儒家的典籍。

中央圖書館在抗戰時收購的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善本以及接收陳群澤存書庫的書，十之六七都是明版書，因之這二年在南京的工作，經過我手考編的明版書大概有二、三千種，逐漸有了心得，稍稍可以從書刻的字體和版式來鑑定它大致的年代。現在我判定明版的年代大致不會相差太遠，這是經驗累積。因為在考編時發現了許多明版偽造的元版，曾撰寫了一篇〈元刊贗品知見記〉發表於國立編譯館的刊物。也蒐輯了不少明代藩王刻書的資料，帶到臺灣來，經整理撰成〈明藩刻書考〉發表。編目需要經常查閱各家的書志、書目，而熟悉各書目的特色，奠定了我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基礎。

民國37年底徐蚌會戰失利，中央決定把南京所藏的文物遷到臺灣來，38年元月我奉派押運首批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與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同船運來臺灣臺中，後來教育部將中央圖書館與故宮、中博院運過來的文物合併設置聯合管理處，並且在霧峰鄉北溝村建造了庫房與山洞來存放。這時期業務簡單，主要的工作就是保管這些書，把運臺的善本開箱核對裝箱清冊，並順便吹晾，我也就利用這個機會翻閱

，因為我編過的二、三千種不過是當中的一部分，所以剛好趁此機會翻閱過去所未經過我手的善本書。41年，在臺大中文系任教的屈萬里先生，也就是中圖的前特藏組主任，他攜來臺有一份圖書版本方面未完成的稿子，因他已數年未接觸善本，參考資料不便，於是交我將它整理增補，後來這篇稿子43年由教育部出版於國民基本知識叢書，名曰《圖書版本學要略》。這是我對版本學做一次有系統的複習。

二、編輯善本書目及傳記索引

43年9月中央圖書館在臺復館，蔣慰堂先生亦復職，任命我為特藏組主任。他要把中圖遷臺的12萬冊善本書提供給學術界人士參考、研究，以紓解當時臺灣藏書貧乏的困境，所以命我積極著手編輯館藏善本書目出版。原先所不敢碰的佛教典籍，現在為了編印書目，也只好硬著頭皮多去參考唐初以來的大藏經法寶目錄，了解佛學分類原則，總算勉強把運臺數量不算少的館藏佛教經典分類編目完成，補充了我這方面的知識。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目於45年出版。接著我又奉命編印館藏宋元版的圖錄，這也是我過去較少接觸的甲庫善本，藉編目的機會，我把館藏四百多部的宋元版仔細翻閱了一遍，記錄書中的版式、刻工以及所鈐蓋的印章。因為有了這一大批的資料，漸漸地對宋元時期各地區、各時代的刻工及印泥的色澤，以及從印章鈐蓋的部位窺視出先後順序有了心得，這都是判別善本書真偽的參考資料，可以說這時期我對版本目錄學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這兩部圖錄於47、50年相繼出版。我編輯善本書目時，因編叢刻書的子目，對《說郛》一書的錯綜複雜，而發生了研究興趣，乃在空暇時取《說郛》所收錄的書，與該書流傳的版本互勘，發現其間時有異同，因知傳本或有殘缺，並非足本。所以我就寫了《說郛考》，48年獲得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的補助，而出版《說郛考》一書，同時對明末書坊刻書版本互讐，改換書名重印有深刻的印象，可惜沒有時間再繼續研究。因為寫了《說郛考》，我又對該書作者陶宗儀下了一番功夫研究，接著大量參考元末、明初的資料繼續撰寫《說郛》作者陶宗儀生年考，及陶宗儀的年譜。因研究此題目，大量的閱讀元及明初文集資料，感到文集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文集中的資料，無論詩或文所記述的事或人，都是當時的文獻。文固無論，就是名家的詩篇所詠，決非無病呻吟，都與時事有關。近代已故名史學家陳寅

恪教授，就曾用元稹、白居易兩人的詩來疏證唐史。而文篇更具有文獻的重要性。中央圖書館收藏的明版書很多，其中明朝人的文集不下於一千種，只是文集篇章甚多，要查起來很不容易，所以過去研究歷史的人艱於檢索，利用文集者不普遍，為了使這些文章便於學者研究利用，我當時就發凡起例主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主要是利用文集裡面的篇章，譬如文集中的小傳、行狀、神道碑、墓誌銘、集序、贈序、壽序等等都是傳記方面很好的資料。不過編這部索引的時候，我人還在臺中，在臺北中央圖書館參加編輯工作的人員過少，而且時間很倉促，所以《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雖是出版了，但並沒有把中央圖書館所藏全部的明朝文集收進去，大概只選擇收錄了五百種明朝名家的文集，以及四十幾種清朝初年人的文集，再加上明代傳記方面的六十多種編成，所以這部書並不是完備的，常常感到遺憾。中央圖書館所收藏明朝人的文集已相當多，再加上代管的前北平圖書館藏善本，其中珍罕的明人文集也不少，可算是全世界明版書最豐富的一個收藏點，所以臺灣可以說是研究明史最好的地方。我希望國家圖書館將來能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補充增訂得更完善，如此對研究明史的人，貢獻就更大了。幾年後，我又獲得中國東亞學會的補助，主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一方面有了補助的經費，我就請臺大幾位教授來協助編這個索引，另方面宋人存世文集有了定型，可以全部採編，所以《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編得比較完善，這恐怕是研究宋史的人必須常常參考的一部書。因為編了宋、明的索引，讓我增加了兩代歷史人物的豐富知識，對研究版本目錄學也大有助益。

民國53年，我提出向美國國會圖書館索回原屬北平圖書館的102箱善本書，由中圖透過教育部、外交部將這批書運回臺灣，這批書在美國時曾經攝照了微捲，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多有購藏，所以美國方面希望我們編一部分類目錄，註明微捲號碼，以便查檢。因日本東亞文庫所編的微捲目錄沒有分類，查起來非常不方便，所以中央圖書館命我編印代管北平圖書館的善本書目。北平圖書館的宋元版大多是宋元祕閣的子遺，多保存了原貌，而中圖所藏宋元版多是在民間幾百年輾轉易手，歷經滄桑，鈐印纍纍，盡失原貌。平館所藏大都是我過去所沒有見過的，與中圖的判然有別，藉這個編目的機會，可以說使我大開眼界，增長識見不少。

三、涉獵族譜及版畫資料

民國58年，美國的譜系學會為了慶祝該會創建75周年，舉辦世界文獻會議，遍邀世界各國的學者代表，在猶他州鹽湖城舉行了一個禮拜的學術討論會，我奉館長包遵彭之命代表中華民國去參加這個盛會，發表的論文題目是介紹臺灣地區收藏文獻的概況，包括善本書、地方志、檔案等等方面的收藏整理出版情形，向各國學術界做一個報導。因為該學會收藏譜牒甚豐，包括美國、歐洲，甚至非洲等國家的譜系，那時臺灣尚無譜系學會的組織，也甚罕研究譜學的學者，為了慶賀該會創建四分之三世紀，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把臺灣的各公家機關或幾個大學所收藏的族譜，蒐得了約150種，編印了《臺灣公藏族譜解題》一冊，帶到美國鹽湖城分贈各國參加的學者，這本小書收的族譜並不多，但開啟了日後譜系學的研究，現在已成為顯學之一了。趁著赴美國鹽湖城參加會議之便，我申請到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補助500元美金，在會後遍訪美日兩國的東亞圖書館，花了40多天參觀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哥倫比亞、耶魯、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柏克萊各大學圖書館，以了解他們收藏中國古籍的情形。在日本參觀了靜嘉堂、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東洋文庫、京都大學等幾個收藏多的單位，使我對中國古籍流傳世界各地的情形有了初步的了解。民國60年，我到澳洲坎培拉參加第28屆東方學者會議，當時在會議中，我提出編纂中國善本書流傳世界各地的聯合目錄，這個建議雖然大家都非常贊成，大會也通過了。但茲事體大，需要大量人力、財力，主持乏人，所以並沒有正式執行。不過這個建議獲得了共識，20多年來，若干館陸續將所藏編印目錄，可以作為聯合目錄的基礎。假若能編印一部全世界收藏善本古籍的聯合目錄，則對研究漢學的學者貢獻甚大。

在中國印刷技術史上，明代是版畫最盛行的一個時代，明朝中葉以後的刻本大都附有插圖，版畫是我國獨有的一種民間藝術，源遠而流長，因此也引起我的興趣，我在空餘時就常常提取明版書來研閱。57年，曾從中圖所藏眾多的版畫書中選取14種明版繪刻俱精的附圖170幾幅，編成了《明代版畫選初輯》上下兩冊，由漢華公司出版，銷售情形非常好。未幾，我離開中央圖書館到故宮服務，這項工作未再繼續。三年前，我應巴黎法蘭西學院遠東研究所的邀請，舉行一次中國版畫發展史的公開演講，那一天來聽講並參與

討論的人相當多，真可謂座無虛席。在法國的朋友告訴我，這是他在巴黎十多年來參加無數次該學院的講演，聽眾最多的一次。這並不是我的口才好，我也不能講法文，也沒有法文翻譯，不過來聽的法國人或美國人都能夠講中文，主要是這個題目比較吸引人，可以說明這種版畫藝術已經國際化了。目前國際方面研究版畫的人很多，但是在臺灣好像還不是很普遍，而中央圖書館在這一方面的資料很多，希望將來能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並編輯出版以資宣揚。

四、故宮七十星霜

在我的學習的領域裡，自認用力較勤、也比較深入的應是中國目錄學。54年11月故宮在臺北外雙溪開院，文物箱件北遷，存放北溝的中圖善本書預定次年春運臺北，我也要舉家北遷，所以我在54年接受臺大的聘書兼課，先開目錄學，後來講版本學、古籍導讀這幾門課程。因為版本學有我跟屈萬里先生編的《圖書版本學要略》做為教材，但是目錄學方面沒有合適的教本，必須編寫講義。初時隔週上課，上課時必須要將下次授課的講義稿交學校繕寫油印，所以相當的勤奮，每兩週至少要寫好幾千字的講義。所幸當時無他工作，只將善本書封箱待運。遷來臺北，又相繼在輔仁大學、淡江大學講目錄學一個短時期。臺大印的講義，每次印一百份，但往往被索一空，幾乎每年都要繕寫油印，為了節省同一講義幾校分別油印，所以我整理修訂一次，用手寫稿請出版社景印供各校採用。我不正式排印者，因非定稿。這份講義用了十多年，雖然我也改寫了其中若干篇，又對歷代目錄如隋志、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目錄學家祁承燁、章學誠等作過一番研究，但定稿迄未竣事，出版商因學生的反應，手稿影印本閱讀比較困難要求排印出版，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央懇臺大潘美月教授代我校訂出版印行，但此書我仍希望由我將來重新修訂完成。

我進到故宮以後，行政工作比較繁瑣，除了業務和教學的需要外，很少做新的研究。故宮整理從南京運到臺灣的清宮檔案，整理編目以及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出版後，因為四庫全書每書前沒有目錄，查考起來非常不方便，我獲文建會的補助，規劃四庫全書索引的編纂工作，成立四庫索引的編纂小組，花了八年的時間，編了三種索引：一部傳記資料索引，一部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一部藝術類分類索引，這項工作雖然是我主持的，實際上我並沒

有親身參與，只是論定凡例及審閱而已。待在故宮這些年，我自認做得較為滿意的工作，是故宮依原式精印了20多種宋元版古書，名曰《善本叢書》，其中絕大部分是僅存的孤本，這當中有17種影印宋元版的跋文是由我撰寫的，這些跋文是有關版本書的寫作，也是我多年來一直宣導目錄學要從傳統中創新的一種體例，也就是把版本目錄融為一體的體例。因為行政工作太瑣碎，很難得靜下來專心撰著，去年是故宮的七十周年，我奉秦院長之命寫了一部故宮發展歷史的書，名曰《故宮七十星霜》，這部書可以算得上是歷史的著作。半世紀以來，我在學術方面研究的領域雖然是版本目錄學，但我踏入國家重要的典章文物收藏機構，是因修纂史籍考的因緣。今在瀕臨退休之際，最後的一部著作也是有關歷史，就我所學而言，可以稱得上始終其事，也不算有違初衷了。

根據我的經驗，離開校門從事工作，不是說學什麼就一定要做這方面的工作，才能發揮你的專長；至於是否合乎興趣，也不是絕對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敬業精神，有了敬業精神你就會從工作中去學習，興趣或另一種專長很可能慢慢地培養出來。圖書館學是為人之學，是服務人群，服務社會大眾。版本目錄學也是為人之學，不是修身的哲學，只不過服務對象，側重在作學術研究的學者專家。在座諸位都是在圖書館服務的，圖書館的確是一座寶山，各位要看書、找資料都比一般人方便，有很多機會充實自己。對於社會大眾的服務品質，就完全看你對館藏了解的多寡，你了解得愈深，能提供的參考服務愈多，就使讀者對你依賴加深而產生敬佩。十多年前我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之聘，主持該館所藏中國舊籍的編目工作的時候，了解到美國收藏漢學的資料特別豐富，他們缺少編目人員，也非常希望圖書館員能對漢學的研究者提供參考指導，但是臺灣圖書館學系對學生文史的培養並不是太重視，故以後圖書館學系畢業的學生向美國申請深造的機會逐漸減少，其文史程度稍差是主要的原因。服務於圖書館的人，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的人，對社會科學文史方面的館藏還是應該多多了解，多多充實，這樣才能贏得社會大眾的尊敬與倚賴。

今天非常榮幸有此機會把我51年來學術的歷程向大家作一報告，只是非常拉雜，耽誤諸位很多時間，非常謝謝。

• 本文由閱覽組張懿文小姐記錄，並經作者寓目修訂。